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

大卫·莱恩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英国)

摘要: 在列宁的影响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个模型已难以充分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边缘依附阶段、维持竞争共生阶段和新均衡阶段。在第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核心国家奉行全球霸权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只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提供者;在第二阶段,中国和西方在经济上处于维持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当前的第三阶段,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国家主权利益的强化和地区性协作组织的建立,形成了相对自主的政治经济体系,成为一种与主导性核心力量互动的“半核心”力量。当前的关键在于,在保持世界经济体系重要经济力量的同时,寻求一种更具合作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关键词: 世界体系;边缘依附;竞争共生;半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F 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5-0036-10

回顾“核心-边缘”理论的经典描述,当前的全球化体系的发展有与之一致的地方,也有许多显著差异。20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年间,许多曾被视为“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都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拥有了能与传统核心国家竞争的强大企业,“核心”与“半边缘”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是始终处在激烈争论之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经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今天,中国等国家也在为世界的未来增添更多的可能性。

一、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模型

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欧洲列强建立殖民地是19世纪后期历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J. A. 霍布森采用了“帝国主义”这一术语,用以描述殖民地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殖民主义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或特殊情形。这些观点对学者们解释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

列宁发展了鲁道夫·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阐释。希法亭强调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的广泛作用,认为“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标:(1)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2)通过设置保护性关税壁垒阻止来自外国的竞争;(3)将其变为国家垄断联盟的开发区”。^①对于列宁来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②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预言,资本主义的矛盾会变得具有国际性特征。帝国主义把国家之间的领土分割纳入了资本主义轨道,使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相对立。因此,列宁以一种二元结构来理解世界经济。结构的一端是在关税保护下占统治地位的处于资本主义体系核心中的民族国家,另一端是依附于资本主义核心、

收稿日期:2018-06-20

作者简介:大卫·莱恩(David Lane),男,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名誉研究员,英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

①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 326.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

处于体系边缘的殖民地国家。

列宁的这一范式极大地影响了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阐释,特别是体现在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作品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由“整个世界区域(包括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①构成。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互作用并由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生产方式。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半边缘国家,有时也被称为“中间地带”^②。尽管这些国家表现出社会主义的特征,例如建立了就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等,但它们却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参与者,反倒建立了重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沃勒斯坦等研究者将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三个区域:核心、半边缘和边缘。核心区域主要是指掌控生产资料与军事力量的主要工业国和金融大国;边缘区域是指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核心区域的国家;半边缘区域则由一批具有一定的核心国家发达经济特征的过渡型国家构成。全球化加快了单一世界体系的发展。在沃勒斯坦的分析中,核心国家的企业由对经济积累(利润)的需求所驱动,而这种积累则来源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③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半边缘国家注定要转变,要么转入核心阵营,要么变成边缘国家。

有人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交融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间的独立交往。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国际化深入到了主权国家中。也有批评家声称,资本主义的漫长过程将所有国家、甚至那些自我界定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纳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些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由一种独特的经济体系构成,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种组成部分,只不过形式不同。

在20世纪晚期,“核心-边缘”模型仍然被用来解释世界体系的本质。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体系的“核心”包含着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这一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精英国家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个核心集团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霸权”^④,西方的文明理念(如个人自由、竞选民主)也往往被作为一种文化优势而加以宣扬。学者们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力量促使俄罗斯和中国等半边缘国家联合起来,或者联合进入核心,或者一起沦为边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各种“改革”运动也正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应。

这些研究取向的一个缺陷在于,对核心集团内部的冲突和多样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也没有注意到所谓的“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之间的冲突,忽视了从政治层面对此进行考察。由各个国家主导的区域性地缘政治利益可能会超越公司经营的全球利益,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核心集团。世界体系的“核心”不再单纯由西方国家主导,它受到兴起的反核心力量的冲击,特别是区域性国家集团构成了对美国全球秩序霸权的冲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与世界市场的接触和接轨,以中国为首,被沃勒斯坦称之为“半边缘”的一批国家开始变得自立,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与西方核心国家竞争。这些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关系已经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71. 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种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国家也是单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同上书, p. 280.

② See for examples, B. Hettne,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279.

③ 边缘国家没有跨国公司。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主要产品的生产是为了直接使用而不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交换。他们拥有小型的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这些公司通常出口初级产品。这些国家依附于核心国家,也在较小的程度上依附于半核心国家。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前现代的特征。他们不是现代世界全球军事联盟的一部分,但却经历国家内战。

④ See B. Hettne, “Introduction,” in Bjö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pp.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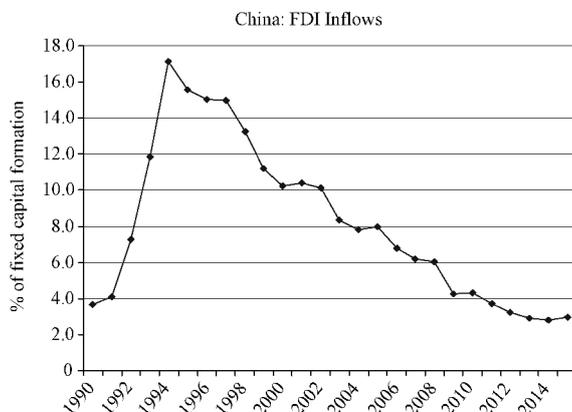
从处在边缘的“依附”转变为维持“竞争共生”^①。就像苏联集团一样,这些新兴国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自主的经济形态。

二、从边缘依附到竞争共生

1979年的经济改革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启。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改革促使中国加入了世界市场。最初,中国经历了一段处于边缘的依附期,当时中国的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欧洲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进行了较小规模的市场改革,这导致了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向。伴随着高度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转向资本主义,放弃了党对经济的领导和调控。他们要么投身于处于核心区域的欧盟,要么像俄罗斯一样,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依存。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存在,后来又与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组织共存。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边缘国家依附于核心国家的时期。乍一看,沃勒斯坦的转型论似乎得到了验证。

值得关注的是,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世界贸易开放上的成功,使得中国靠着核心国家的投资及市场而跻身“新兴力量”。不过,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少,固定资本构成的国内比例越来越高。表1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趋势,中国与核心国家的关系正在从边缘依附转变为维持竞争共生。

表1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构成总额的百分比,1990年—201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16年。参见 www.unctad.org/annex_tables. Accessed March 2017

人们曾普遍认为,中国会因为与西方主要经济强国的竞争而衰退。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中国将会变成一个边缘国家。许多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是无法开启“真正”的经济改革的,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进行这种政治改革。一直到2005年,西方著名学者彼得·卡岑施泰因还预计日本会是一个超越中国的世界力量^②。这个预测并没有应验,现实恰恰相反。美国掌握着政治霸权,但它已经面临着经济挑战。而中国则从边缘依附地位走向了与西方国家维持竞争共生。

到2015年,中国几乎不再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如表2所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例(仅占资本构

① Alberta Sbragia, “The EU, the US, and Trade Policy: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7, 3(2010): pp. 368–382.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7.

成总额的 2.7%) 不仅低于非洲(10.6%) 和拉丁美洲(10.6%), 而且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4%)。这些数字揭示了中国可维持的(而不是依附式的)经济发展的本质。

表2 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构成总值的百分比: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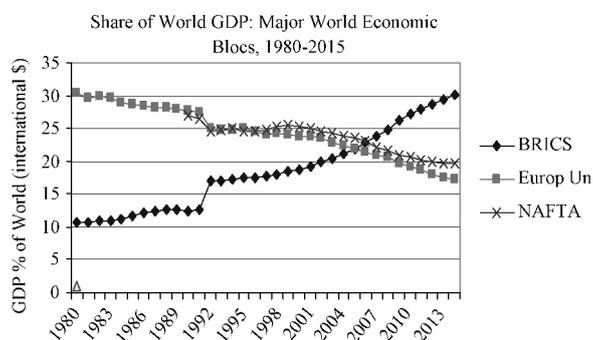
Developed Economies	5.4
France	2.5
Germany	0.2
UK	14.4
USA	2.8
Japan	0.2
Developing Economies	7.4
Africa	10.6
E. and S. E Asia	6.3
China	2.7
Latin America	10.6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 2015年, 表7。

中国竞争共生策略的成功运用, 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区域经济力量的相对下降。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通过一些指标来衡量: 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实力, 源于其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即人口的数量和质量; 而从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分析, 最终会指向“软实力”。在所有这些方面(除武器装备外), 美国的地位都在相对下降, 中国的地位则在上升。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自主, 同时, 中国企业在与西方企业的竞争中也开始占据优势。

这种惊人的增长可以由下述数据所证实。如表3所示, 与中国领导的新兴金砖国家集团相比, 西方核心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有所下降。应该指出的是,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金砖国家这三个区域性组织并不具有可比性。欧盟不仅是一个关税联盟, 也是一个联邦性的超级国家。北美自贸区是一个成员国能够自主确定对外关税的自由贸易区。而金砖国家则是一种区域化合作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组织, 组织内的成员更多地通过非正式安排而不是官方合作开展交流。

表3 1980年—2015年世界GDP比重: 金砖国家、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5年。参见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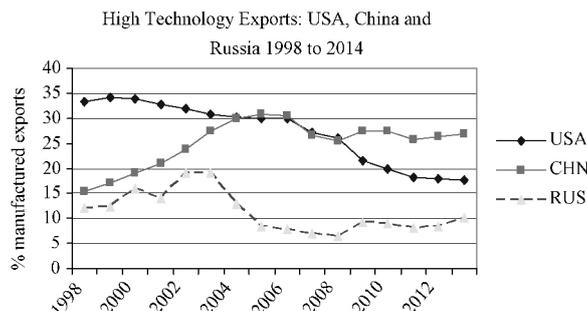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世界GDP占比持续下滑, 金砖国家的占比则迅速增长。1980年金砖国家GDP还仅占世界GDP的11%, 2007年其份额就已经与欧盟相同。到2015年, 金砖国家占到30%——比北美自由贸易区多出10多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与核心经济体的竞争共生导致了核心国

家的去工业化,使之前的半边缘国家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

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赶上了美国(中国的统计方法与此不同,按照中国的统计,其GDP总量至2018年仍位居世界第二)。如果将金砖各成员国的贡献进行分解,可以发现其他金砖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优势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如果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三者联合起来,将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军事能力,也拥有着巨大的内部市场。

增值产品的出口也是经济活力的一项指标。在这方面,美国的份额持续下降。如表4所示,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作为所有制成品出口的一部分)份额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而中国制成品出口一直在上升。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出口来自于西方国家的产品的外包。在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方面,新兴国家仍然落后。

表4 1998—2014年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资料来源: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世界银行数据库,2015年。

世界经济力量的天平正在从核心国家向东方倾斜。表5显示了1980年和2016年世界GDP相对占比排名前11位的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这里并没有将经济集团内所有国家的数据都列举出来,但这两组数据的组合对比显示了1980年至2016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相对地位的明显变化。1980年,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GDP占世界GDP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到2016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为不到一半。主要欧洲国家的GDP占比急剧下降,这促使欧盟为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采取不断扩张版图策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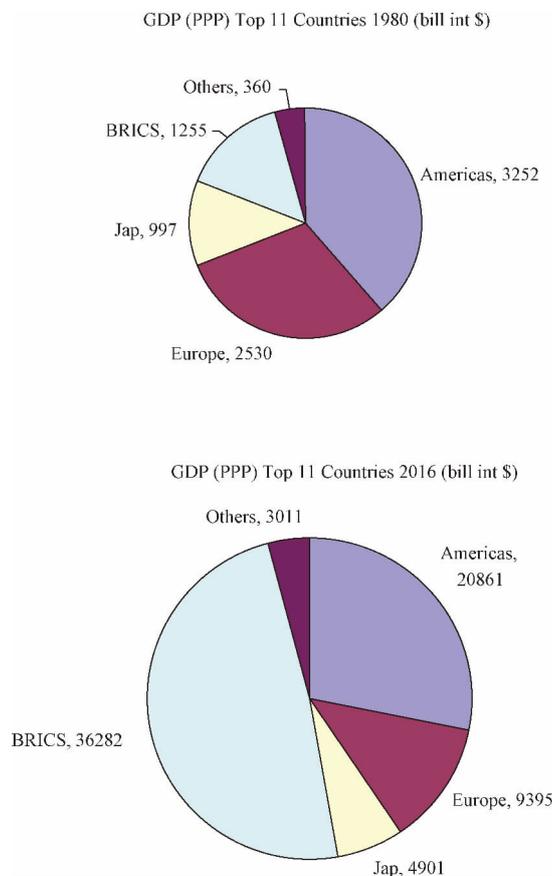
核心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世界2000强上市公司数量。福布斯排行榜从四个方面来衡量公司的实力:销售额、利润、资产和市值。世界经济力量的重心正在从西方核心国家转移。在2015年,亚洲共上榜691家公司,而欧洲只有486家。中国有200多家,数量超过了日本。金砖国家共有370家公司上榜,其中印度57家,俄罗斯27家,巴西24家,南非14家。这一年欧亚经济联盟仅有28家上榜,显然是一个次要的经济体,这说明了金砖国家内部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且,中国有5家公司进入了世界10强,有13家公司进入世界100强。与上市公司以能源开采行业为主的俄罗斯不同,中国的上市公司涉及各行各业,包括银行业、材料、交通运输、保险、公用事业、石油和天然气、科技和硬件、耐用消费品以及食品和饮料等。不过,金砖国家上市公司的总数只是美国上市公司数量的60%多,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霸主。

传统的世界经济核心区域的经济实力发生了显著变化。去工业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的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的重要经济与政治因素。1980年至2007年间,中国与核心区域间的关系从边缘依附转变为维持竞争共生。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人均收入,情况会有所改变。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远远

① See J. Borocz, “Geopolitical Scenarios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Jody Jensen and Ferenc Miszlivetz, eds. *Reframing Europe’s Future: Challenges and Failures of 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20–34.

落后于西方国家。将人口纳入计算后,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3345美元,俄罗斯为23286美元,美国为53245美元(挪威最高,人均67614美元)。就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而言,中国排在第90位,远低于俄罗斯(第49位)和美国(第10位)。该指数是对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和收入的综合考量。^①不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西方核心国家仍然保持着霸权地位,但将新兴国家定义为依附性的“半边缘”国家已经不再合适。

表5 1980年和2016年GDP排名前11位的国家(地理区域划分)(数据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6年,以购买力平价(当前国际美元)为标准显示的数据。在该图中,前11个国家被按照地理区域做了划分。

三、“半核心”的兴起

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的成功得益于国家的有效规划。这些企业在所有权上有着相当规模的国有成分,董事会也主要由本国人组成。尽管受限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偏见,它们难以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但仍在进行着国际贸易。中国和俄罗斯既被排除在核心经济集团(欧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也被排除在核心军事霸权联盟(北约和之前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外。于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集团。

这就是我所界定的“半核心”。半核心国家具有(或者会去发展)它们自己的国民经济特殊形态。无论他们的经济是何种形式,他们与美国领导的霸权主义核心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半

^① 参见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2016_human_development_report.pdf

核心”指的是这些国家既容纳了外国公司,同时也拥有自己的民族企业和跨国公司,他们的经济是具有自主性的。

半核心国家主要指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企业与核心国家的企业相互影响、交流和竞争。由于国家体量大、经济实力强,在从学习核心国家到能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始终都有足够的自主性。它们受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的影响较少,追求内部驱动式的经济发展。在这些行动中它们也在寻求本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图6显示了半核心集团与霸权集团的关系。世界经济的核心由美国的资本家和军事利益集团主导的霸权集团组成。核心内有其他区域性力量,如欧盟和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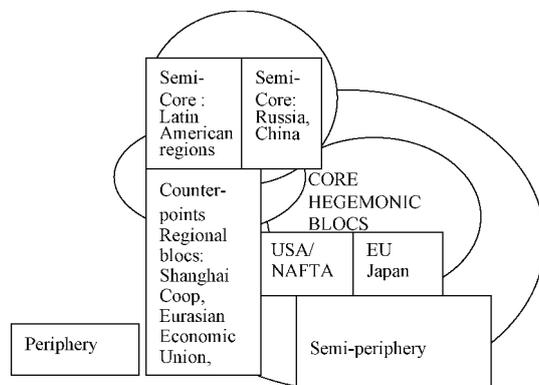


图6 世界体系:核心、半核心的对立面,半边缘和边缘

半核心国家通过组建区域经济和政治组织加强经济和政治安全(如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中亚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这些组织既源于内在的动力,又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全球经济危机所释放的不确定性以及西方更具挑衅意味的外交政策的回应。对于世界体系中的这些半核心国家而言,区域合作并不是对全球化原则的简单套用,而是要使国家集团能够加强与霸权国家抗衡的力量。它们保持着自己的边界,主要以双边协议和条约的形式进行国际交流。它们更提倡国际主义而非全球化。

这一分析要求对希法亭/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进行重大修改。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和依附型边缘国家的二分被从前殖民附庸中挣脱出来的竞争性集团和地区所改写。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在殖民地受到革命的挑战,而是面临来自其他主权国家阵营的竞争。

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不同的观点相互争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有着多种可能性。一些政治和经济精英坚持要继续实行维持竞争共生的策略。而另一些人则谋求更强势的国家主权,并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反霸权的方向发展。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是,西方国家是否有能力通过行使经济、政治制裁以及军事手段来应对新兴大国的发展,以维持其霸权地位。

在西方经济相对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各种形式的强硬政策。西方批评者认为,俄罗斯不仅使一个错误的经济模式合法化,而且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霸权,这构成了地缘政治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并采取了小规模军事打击和武装行动以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在俄罗斯方面,其面临着北约的扩大。此外,在南斯拉夫、东乌克兰、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等问题上的争论,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争夺市场和确保地缘政治安全。

中国维持竞争共生的策略削弱了霸权国家的经济,但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来自美国的安全挑战。它要面对驻扎在太平洋上的大规模美国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已经通过其“重返亚洲”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做出了回应,日本也将中国视为其太平洋地区领导者地位的威胁。与日本、韩国以及菲

律宾的历史争端加剧了商业冲突。2016年2月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不包括中国^①。这一协定在降低合作伙伴之间关税的同时,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

中俄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反应是组建和加强区域组织: 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竞争共生提升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并强化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政治系统的区域化合作。其前景是转向一个更具独立性的、与西方强权政治不同的反霸权权力体系。这种区域化新形态的重点在于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并促进发展: 在欧亚阵营方面是维护主权和进行“再工业化”; 在中国方面是促进经济发展。这两方都强调政治认同,谋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各国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主权观念,反对建立诸如欧盟或苏联的超国家地区。

中国的目标是在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加强区域性组织的建设。这是上面提到的维持竞争共生关系的补充。中国的区域性政策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开创了交流合作的新模式。例如,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②的重要性。

无论出于领导人多么良好的意愿,经济和政治集团的建立总会导致竞争。中国在出口方面取得的成功导致的是其他国家或外国公司业绩的下滑。当西方霸权国家可以与中国竞争时,自由贸易在政治上就是可以接受的; 当它们无法与中国竞争时,同样的自由贸易就会被重新定义为“倾销”。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中国的政策是利他主义的,是促进和平并有助于亚洲稳定的。然而,中国在区域性力量的塑造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一点引起了邻国以及美国的猜忌。

中国的区域政策有其独特的形态。它力图维护其政治主权,同时着力构建渐进和开放的区域化形势。它采取双边的、非正式的和区域内合作的方式而非诉诸正式的约束性条约(如欧盟),这为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发展提供了平台。这些新举措也反映出中国越来越重视与邻国的文化和历史联系,这方面还需要在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语境下进行分析。这种区域化首先是互动和协同发展关系建立的过程,然后通过签署条约得以加强。

四、进入新均衡阶段

在当前的第三阶段,中国在地区关系中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也寻求在地缘政治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地位是与俄罗斯共享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兴大国的力量会如何发展,对国际关系格局会有怎样的重大影响。

尽管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同,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着来自外国势力的挑战,这些挑战促使中俄愈发亲密,携手维护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退回到重商主义的堡垒之中,相反,两国都对核心经济大国保持着积极的政策。它们采取的根本策略是发展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区域集团,在不影响与欧美国家关系的情况下增进自身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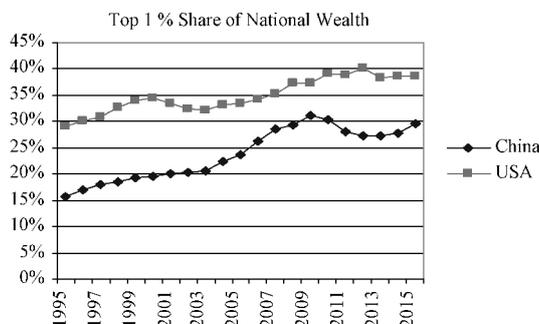
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主要参与者的同时,维护好自身的主权和政治经济权益。一种情况是,在世界当前主导性强权的框架之内加强这种竞争共生的关系。半核心国家内部有着矛盾的经济诉求。在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阶层可以划分为国家主导的支持者和市场主导的支持者两类。中、俄等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倾向更重视市场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公司的扩张以及各分公司利润的回流(母国也会从中受益)。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的管理者也能够市场化的过程中获益。

① 它曾包括美国、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越南等国。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②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在早些时候,社会主义使苏联和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当平等,这种平等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在中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国家财富的比例从1995年的15%上升到2015年的30%。表7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比美国略低一些,但在逐渐接近美国。富裕者也有生活上的特殊享受,包括获得私立教育、在海内外投资、享受富裕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奢侈消费的机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许多城市市民、各行业的从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市场经济的结果,支持保持甚至加强与西方的竞争共生关系。

表7 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口所占国民财富份额:美国和中国,1995到2015



资料来源: F. 诺夫科密特, T. 皮凯蒂, G. 祖克曼, “从苏维埃到寡头: 俄罗斯社会收入不平等状况扫描, 1905—2016”。国家经济研究局, 工作文件系列, 编号: 23712. 2017。

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坚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人民幸福的定义,从只关注GDP增长转向了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发展进步。充分就业和财富分配上的社会平等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并由政府健全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中国的政策正在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解决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问题。习近平所提出的反腐败战略思想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思想,则会改变并有可能扭转当前市场化进程中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对世界政治的另一种选择是新均衡关系,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包括建立一个具有自身结构和话语体系的特殊集体。在国内,这样的社会形态是有着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将在发展私营企业的背景下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在国际上,世界政治将从西方主导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多极化。中国和俄罗斯将成为多极化的重要支柱。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合作集体;另一个层面的友好协作可能会在金砖国家和其他不结盟国家之间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与西方核心经济体的关系将会由维持竞争共生转向构建新均衡。全球多边互动网络的作用将会更加有限,代之以区域性关系,中国则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领导者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即区域发展到底是会走向与西方核心国家更多的相互依存,还是会形成更具自身独立性的新均衡关系。前者在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受到青睐,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维持竞争共生的关系。但最近,新兴的大国更加重视自己的主权利益,以应对西方核心国家制造的经济与政治问题。成为经济上的“半核心”力量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的中国正在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寻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面临着挑战,关键在于,以保持自身重要经济地位为前提,能否寻求到一种具有合作性、也更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选择。这也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的重要影响。

(译者李洋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The Influ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David Lan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K*)

Abstract: Lenin'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had influenced Immanuel Wallerstein'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ld capitalism. Wallerstein divided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ree sectors: core, semi-periphery and periphery.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ising economic powers like China, this model has been difficult to fully explain the new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suggests three phases in the post-reform evolution of China: peripheral dependence, sustainable interdependence and countervailing power. In the first phase, the industrialized core led by the USA asserted global hegemony and China as a rising economic power became a provider of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es. The second phase was on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hich involved market competition with Western companies. In the current and third phase, the assertion of national state power and the setting-up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have created relatively autonom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mations.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social formation, a semi-core, which interacts with the dominant core. The current challenge i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a more cooperative and socialist form of society while remaining a major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system.

Key words: world system, peripheral dependenc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 semi-cor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刘曙光)